

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 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

陈 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 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

陈 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陈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61-5675-9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423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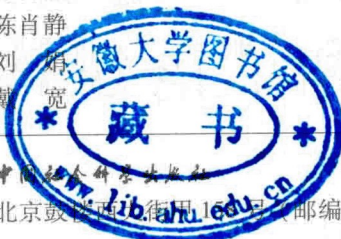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16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03千字

定 价 3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1)
一 转型阐释语境中的类型替换诉求	(13)
二 转型阐释与类型替换的未完成性	(20)
三 转型目标及其争议	(31)
四 延续还是断裂? 转型阐释的局限性分析	(44)
五 转型阐释与多元化	(61)
六 转型阐释语境中的话语建构探索	(69)
参考文献	(155)

前言

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充满了急遽的变化，而且还能体察到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由文学理论研究发展演变的自律造成的，其更重要的推动力应该是外在的、宏观的，与整个中国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 20 世纪 90 年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众多研究者所给出的答案必然是多元的，阐述肯定也是驳杂的，但有一点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例如，学者孙立平就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①又如学者陶东风也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②。再如学者张颐武也曾明言：“但有一点是九十年代初许多人没有看到或不愿正视的，就是无论如何，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型，无论你怎么评价这种转型，也无论你对这一转型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拒绝承认业已无法继续下去了。”^③学者张旭东也认为：“这一‘十年’戏剧性的、常常是分裂性的曲折与转向，只能和中国惊人的持续增长和政治稳定相媲美。两者都建立在愈演愈烈的不平衡发展和社会分层之上。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激烈的重组中，持续不断的动荡与混乱的威胁同某种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神秘化的秩序和标准相依随。随着政策

①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②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多远与沟通（代前言）》，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 页。

③ 张颐武：《反思九十年代：新的课题与挑战》，《文学自由谈》1998 年第 2 期。

‘放宽’这一富有张力性的进程的展开，中国的每个领域里都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①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展现的巨大变化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其外部的因素主要在于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以政治制度为区分标准而形成的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局面立即瓦解，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形成，并已经保持了几十年的相对均衡的态势也随之被打破。分化、瓦解后必然要有新的联合、乃至整合。于是，活跃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各类利益集团开始“希望”寻找到一种“新颖”的聚合模式，以区别于在冷战思维支配下形成的、以相同的政治信仰为核心利益结合点的结合方式。此时，经济发展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一种利益集团间“全新”结合方式的可能选项。强调经济合作，强调“双赢”甚至是“多赢”，在很多人看来可以完全有效地对抗那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思维模式。此后又有了“全球化”理论在世界各地的风靡，使得经济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新格局中的核心话题，而用经济合作“取代”政治领域的对抗也成为很多人对于世界新格局的主流认识。

在这种全新的国际大环境下，对于已经失去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依托的中国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使用全新的形象面对各种挑战。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突出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的强国便成为树立全新中国形象的主要手段。淡化姓“资”姓“社”的争论、强调深化改革、突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重视民生等诸如此类的话题从此时开始逐渐演化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针对 90 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变化，有学者就认为：70 年代的中国是“政治中国”，80 年代的中国是“文化中国”，90 年代的中国则是“经济中国”。^② 要建设“经济中国”，就必须推行相应的经济改革措施，以便于尽早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而随着改革

^① 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 年代中国与 20 世纪的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 页。

^② 王岳川：《中国镜像：90 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21 页。

措施的出台，诸多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变化开始在中国社会的经济领域出现了。孙立平就指出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三个背景因素密切相关：“第一，在 9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处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而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模式和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第二，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发生，导致了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盟和对立关系的出现。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对中国社会社会力量的重组和社会生活框架的重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①

通过孙立平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体制改革虽然只是从经济领域发端，但其影响力却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力的浸染。文化环境、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学术争鸣等众多看似与商品交换距离十分遥远的事情再也无法摆脱市场的那种无形魔力。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真正注意到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流行歌曲等在内的以获得商业利润为最终目的的大众文化在普通百姓生活中的横行无忌。虽然在 20 世纪前半叶此类大众文化在中国就已经形成过热潮，而且港台和欧美各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随着改革开放在大陆地区逐渐流行，但直到这个时候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这种彻底市场化的产物——大众文化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乃至自身价值的影响。特别是 90 年代初期，原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并被诸多学术精英刻意忽视的王朔小说在影视传媒强力推动下的火爆，更是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市场因素腐蚀大众传统审美习惯的例证。面对这些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一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少思考的问题，如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异，文人“下海”，“纯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的寂寞，等等，而这些话题都与当时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热点的话语环境密切相关。

①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 页。

与对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相吻合的是,众多研究者在展开 20 世纪 90 年代人文科学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时都建立了一种比较相似的阐释体系:变化是从经济体制的改变开始的,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的变革,它还是一种由于经济体制变革而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进而引起了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和学术研究的变化。例如,学者王岳川就曾明确指出 90 年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正处于“知识谱系转换中”,他详细分析到在知识领域:“首先,研究的范式发生了逆转:由外在呼唤人性解放、理想、正义等堂皇话语转入人的意识拓展、语言游戏和结构分析,由追求传统同一性辩证法转到现代否定辩证法。其次,学者的使命变了:不再具有‘元话语’,转而日趋精细剔解与局部论证;并由知识的启蒙变为知识专家控制信息。再次,教育的本质变了:学生不再是关心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而是在终端机前面获取新类型知识的聆听者。教师也不再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其地位将被电脑信息库所取代,出现在学生面前的不再是教师,而是终端机。”^①再如,学者王晓明在分析 90 年代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时就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从 1989 到 1992,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同样,它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②接着,他进一步指出:“1992 年新的一轮‘市场经济改革’重新启动,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的改变,这个变化非常之大:一方面是经济生活领域一些状况的明显改变,同时也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随着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巨大变革,新的阶级产生了,其中第一个就是暴富阶层(后来也被称为‘新富人’),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失业阶层。这是从经济领域方面来讲。然后在文化等其他领域,如教育、出版,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迷茫,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个变动的现实。”^③最后,他分析到:“社会的巨大变动,

① 王岳川:《思·言·道》,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6—177 页。

② 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③ 同上。

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①

王岳川和王晓明的分析有力地印证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引发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而社会文化的变化又促使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出现了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将启蒙作为自己的统帅大旗，以浪漫主义式的激情憧憬着理想中的“现代化”，他们将自己看成是全知全能的并继承了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悠久历史的忧国忧民传统的社会精英。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些受到广泛推崇的必然是情绪激烈的文字。在这些文字里，批判矛头的指向从历史到现在、从文学内部到文学之外，几乎无所不包。因而80年代的文学作品，多数“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这种“沉重、紧张”，既是指“情感‘色调’”，也是指“结构形态”和“作品的‘质地’”^②。然而到了90年代，不同“质地”的文学作品开始大行其道，虽然“精英”们用轻蔑的口吻将这种文学作品称之为“帮闲文学”“痞子文学”，将其视为是文化危机的表现和文化堕落的开始并加以大力的口诛笔伐，但这并没有扭转异质性文学作品不断兴盛的局面。甚至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现自己的言论已经失去了鼓动性和权威性，自己几乎成为市场化进程的弃儿。知识分子此时的疑惑是现在这种十分尴尬的局面难道就是自己曾经千呼万唤过的“现代化”？自己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自己还能干预社会生活吗？面对这些由社会变化带来的“危机”“焦虑”和“迷惘”，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市场化冲击下的自我身份问题，开始思考如何建立新语境下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话语立场问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90年代学者们会热衷于人文精神、新保守主义、后现代等泛文学问题的争论。总体来看，此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有疑惑、有迷茫、有焦虑，甚至可能还有些不满，但他们更想用理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变化、认识这些变化，以便使自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改变，甚至企图在认识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去“引导”它们的发展方向。既

① 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然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知识分子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些变化是相对于哪个具体的参照物而出现的?这些变化在思想领域、学术研究领域又会有怎样的体现?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就发现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 80 年代所追求的崇高、所倡导的启蒙,以及激进、浪漫的时代情绪等自己曾经完全肯定的东西投出怀疑的目光,并且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无论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王蒙的“躲避崇高”,还是郑敏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都被视作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乃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思想进行反思的代表性观点与作品。在这种反思的语境下,当一些学者在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色、学术研究的特点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 80 年代作为一个标尺进行比较,力求通过比较两个十年的差异,寻找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

例如,王岳川就认为与 80 年代相比,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学者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治学方法、学术心态、人格结构和言说方式上,开始作出由‘建构’到‘解构’的根本性调整。”^①其具体表现为“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世俗化”“非主体化”“反方法论”“反本体论”“泛审美文化的兴起”“后现代性情结”“城市大众文化热”。^②在王岳川看来,这八个方面的“候症”是他“基于个体心性意向的学术良知的描述”,不能被当做“历史年鉴”来对待,但他在“候症”描述中提到的诸多现象,如一大批与知识分子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同紧密关联的丛书、专著、期刊的相继出版,80 年代的“西学热”被 90 年代的“国学热”所替代,知识分子“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告别 80 年代的“理想化”,90 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代替了 80 年代“感性审美的沉醉”,以城市民谣、城市小说为代表的都市休闲文化的兴起……都具有鲜明的 90 年代特色。又如学者张颐武也曾直接指出:

① 王岳川:《中国镜像:90 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 页。

② 同上书,第 33—38 页。

“我以为 90 年代初叶所显示的文化征兆在与 80 年代的差异中呈现了自身的‘特性’”。^① 并进一步认为这种“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激进/稳健的对立是 80 年代与 90 年代文化的显著差别。90 年代的文化具有稳健的特点，任何变化都是缓慢的。人们又回到了坚固的话语之中。其次，在欲望/规则之间，90 年代的文化认同于规则，它表述规则的永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及其在语言中的不可变更性。第三，在无序/有序之间，90 年代的文化强调有序性，强调因果关系和连续性，认同于有序的编码，强调历史/文化/政治的可靠性。第四，在逆反/认同间，90 年代的文化更强调认同的重要性，它肯定既有知识/权力的可靠性。第五，在解构化/合理化之间，90 年代的文化强调整合性的存在，强调能指/所指、语言/实在间的缝合，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缝合，它不再尝试制造断裂或零散的语言状态，它不试图打破幻觉，而在于稳定话语的运作方式。”^② 再如，学者杨颢也认为：“90 年代思想与学术在很大程度上肇端于对 80 年代富有激进主义色彩的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重建。”^③ 在这一逻辑原点之上，杨颢还进一步分析了 90 年代知识分子文化及其思想学术的流变，并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放弃 80 年代启蒙学者的理想主义，坚持低调务实的实干精神，少谈主义，多讲问题”；二是追求“思想与述学的个人化”；三是“学术重心由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学理资源从德法传统转向英美传统”；四是“人文学科走向后科学知识观”；五是“淡化民族主义情感”。^④ 学者陈思和在谈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潮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也许是在 80 年代的实践中认识到五四以降知识分子传统的脆弱，90 年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工作是通过各自的立场来反思和弥补这一传统的先天性局限。”^⑤

除了以上提到的四位学者外，还有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表

① 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2 页。

② 同上。

③ 杨颢：《90 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④ 同上书，第 19—21 页。

⑤ 陈思和：《关于 90 年代文化思潮的一点想法》，《山花》1998 年第 8 期。

述过类似的观点。从这些学者的分析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学者在谈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改变时都是相对于 80 年代而言的,80 年代就是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参照物。所以在研究 90 年代的一系列问题时,学者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 80 年代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阐释问题的切入点。对于这一点,张颐武就曾指出:“‘新时期’无疑是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索无法回避的起点和背景,也是强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文化选择的‘经典’性话语。任何新的文化及‘知识’生产都无法跳过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而只有面对它的巨大资源。”^①

在 80 年代的“巨大的历史背景”和“巨大资源”中分析探讨 90 年代的问题,这不但在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社会进程等相关的宏观问题时有着显著的体现,而且在具体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也有展现。由于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所以随着社会文化的演变,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动向、新的变化。而在研究、探讨这些新动向、新变化时,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学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中国 90 年代的相关问题时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很相似,都是着力分析 90 年代与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环境、学术思想氛围、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演变、学人的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知识观的对立等多个方面的不同,并通过对两个十年的比较追索答案,力求归纳总结出相应的结论。通过分析学者们意识到,要认识 90 年代必须从 80 年代入手,而且一些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刺激知识分子神经的文化事件、文学现象是在 80 年代不可能发生的,两个十年间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巨大变化。因此,对于 80 年代的思想风潮、话语体系、学术成果的研究、质疑乃至批判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很多学者研究 90 年代文学理论问题的出发点。这不但在时间意义上的出发点,而且还是思维逻辑上的起点。

例如,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是无法避免外部因素介入的,但大家发现当中国进入 90 年代后,这种

^① 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外部的作用力已与 80 年代的对文学理论研究不断施加影响的传统外部作用力大不一样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经济因素成为了外部作用力的显性主角，而过去起到主导作用、甚至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因素似乎已退居二线。或者，针对这一变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和政治因素相关的诸多外部作用力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直接支配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式，开始尝试采取间接的、稳坐幕后的手段影响、引导、指挥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向。从 80 年代的政治“主导”到 90 年代的经济“挂帅”，正是这种外部作用力的改变，才使学者们开始进一步关注类似于为什么经济因素能影响到文学理论研究？经济因素又是通过哪种动力机制影响文论研究的等问题。也正是这种改变，才促使部分学者开始思考 8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纯粹性，并将这些思考作为自己在 90 年研究文学理论与政治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参考。应该说，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类似的改变还有很多，这些改变也的确给相关研究者带来了强大的冲击，迫使他们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身处于 90 年代的学者无论是在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方面，还是在所讨论的内容以及讨论时所采取的策略方面，都主动做出改变并与 80 年代形成一种对比。例如，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80 年代和 9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就能发现很多的不同。能在 80 年代形成讨论热潮的文学理论问题，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人性、人道主义、典型、形象思维等都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内部和 50 年代“百花文学”时期就被学者提出了的，而 80 年代讨论这些问题时学者们所使用的“话语资源”和“阐释策略”也都来自于上述两个时期。甚至有些问题的讨论就是为了直接迎合政治的需要，是在文艺上的“拨乱反正”，那些有利于当时政治进程的文艺讨论及其结论也都会得到某种默许乃至支持。而且，一些原本只应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讨论的问题，却具有了极强的“弥漫性”，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兴奋点”。此时的文学理论研究似乎已经没有了什么门槛和专业性，只要是读过一些文学作品、有感悟、有思考、有责任感的学者，或者说只要是一位有点话语权的人，就可以针对相关的问题发表看法。但这一切在进入 90 年代后都发生了改变。跟随着文学、美学等学科的脚步，文学理论研究也开始逐步远离社会生活

的中心地带。在 90 年代, 要让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如 80 年代一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几乎已经没有了可能。而且这一时期在学术界能形成讨论热潮的问题, 如人文精神、保守与激进、现代与后现代、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市民社会等几乎都是众多学者面对时代变化时提出的全新问题。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滞后性”的逐渐减弱, 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国外学者如德里达、福柯、葛兰西、贝奥塔莱、赛义德等人的思想被中国研究者广泛应用。并且这种广泛应用也摆脱了 80 年代多围绕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使用西方文学理论分析的做法, 而是将国外学者的思想运用到诸如文化思潮分析等更加宏观的领域。这些都使得 9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资源和阐释方式得到了刷新, 也正是这种刷新从内部促使了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如张颐武所说: “在新的文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之中, 新的批评理论发展所具有的‘知识’前提亦已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出来。与文化转型相同步的理论与‘知识’的转型已成为目前文化发展的最为活跃而具有创造力的部分, 新的话语形式与阐释策略正在迅速走向成熟。”^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 学者们在阐释相关问题时已经不再单纯地使用“变化”“改变”“转变”“转化”“变更”“转折”“演变”等词汇, 而是更多地使用“转型”一词描绘 90 年代的中国。这一点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例如, 学者们在相关论述中会说“历史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思想转型”“学术转型”“知识谱系转型”^②“研究转型”“方法论转型”“话语转型”等等, 不一而足。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 学者们为什么喜欢使用“转型”一词, 而不再简单地钟情于“变化”“改变”等词汇了呢?

作为被众多研究者频繁使用的重要词汇, “转型”一词是被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从政治、经济领域借鉴而来, 它最早出现于 1986 年分析

① 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 页。

② 王岳川:《中国镜像: 90 年代文化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2 页。

研究社会体制变革的文章中（参见《掌握农村经济转型的度》，载于1986年1月20日《人民日报》），三年后开始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使用（参见《“转型期”创作谈》，载于《人民日报》1989年2月28日）。^①特别是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目标提出后，“经济体制转型”就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词汇。但令人奇怪的是，“转型”这个出现在二十几年前并已经在90年代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高曝光词汇，在一些重要的字典词典中却没有详尽的释义，甚至包括1999年版的《辞海》也没有将“转型”一词收入。直到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版）》最后所附的“新词新义”中才将“转型”一词列入，其释义有二：一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二是指转换产品的型号或构造。^②从这两个释义可以看出，词典编纂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转型”这个词与转变、转换等词没有区别，只是在适用范围上有所限制。词典编纂者对于“转型”的这种解释，是不是就意味着当“转型”一词应用到文学理论研究中时它的含义与转变、转换、变化、转折等词没有区别？对“转型”一词的使用难道只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为追求表述效果的陌生化而进行的同义词替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如果“转型”只是“变化”等词的同义词替换，“转型”所描述的现象如同“变化”一样简单，那就不会出现诸如9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阐释中国的焦虑”^③此类的观点了。虽然很多学者在描述90年代的中国时都愿意说此时的中国社会经过“巨大的历史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90年代与80年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质的飞跃，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完全的断裂？许多人在描绘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思想取向以及社会风潮时就使用了诸如“告别革命”“放弃启蒙”等足以显示与80年代决裂的醒目词汇，这似乎也证明了某种断裂的真实存在。这些变化我们当然要注意，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

① 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30页。

③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页。

到出现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改变其程度是有限的，这是一种低烈度的反应。而且，我们更应该注意到 80 年代与 90 年代之间还存在着部分的一致性和继承性，许多变化在 80 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只是到了 90 年代这些“端倪”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才趋于明朗化、表面化，才成为不断刺激众多研究者神经的敏感话题。经过冷静的思索、理性的分析，研究者们认识到与 80 年代相比，90 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发生了改变，但这又不是一种质变，所以要科学、准确地阐释 9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就必须选取一个身处在不变与质变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理想词汇。而从经济改革领域借鉴而来的“转型”一词恰好可以担负起这一重任。此外，学者们乐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使用“转型”一词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包含的内在意味也要比“变化”“改变”“转变”等词深刻得多。首先，使用“转型”一词就意味着相对于 80 年代而言，90 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但出现了变化，而且还是一种类型的变化。其次，“转型”一词表明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缓慢演变的过程。再次，虽然这变化尚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但它不是盲目的变迁，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与 80 年代不同的文学理论研究“类型”。所以分析“转型”这一关键词汇的内在意味，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会有极大的帮助。

一 转型阐释语境中的类型替换诉求

诸多学者在分析、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特征时，经常都会使用转型一词，其原因之一就是与变化、改变、转变、转化、转折、演变等词汇不同，该词不但标明了与 80 年代相比 90 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着“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以“变”为核心的“类型”转化。“型”这个字的使用可被视为是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转型阐释的关键之所在，它表明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与 80 年代相比 90 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改变和替换。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转型一词所表达的理论内涵和福柯所提出的“认识型”（episteme，也被译为知识型、认识图式）概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福柯在其早期著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提出了“认识型”的概念，他说：“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识型（l'épistémè），在其中，撇开所有参照了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知识，奠基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它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而是它的可能性状况的历史；照此叙述，应该显示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①在福柯看来，认识型实际是一种“分类原则”，它是“决定知识形式和方法的框架和判断真假的一般标准”，并“决定着一个时期的一切知识和常识”^②。福柯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这就是“认识型”，一

①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前言》，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0 页。

②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1—262 页。